第 16 卷第 4 期
2013 年 10 月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m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6, No. 4
Oct., 2013

从孤介之气到平和之心

——论晚唐至南唐隐逸诗的新变

郭　倩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晚唐时期隐逸诗蔚为大观，其中相当部分诗作表现了诗人对艰危世事的忧惧、对社会不公的怨愤与不甘，体现出孤介不平的气质。而与晚唐相比，南唐隐逸诗在意境的营造上更加平和舒缓，在情感的抒发上更加平和圆融。这种变化与南唐士人生存环境的变化以及传统儒家精神失落而导致的士人心态的转变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诗人追求诗歌风雅含蓄之味的自然结果。

[关键词] 隐逸诗；孤介之气；平和之心；晚唐；南唐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3) 04-76-06

隐逸历来是诗歌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之一。它从先秦发源，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晚唐五代，越显出旺盛的生命力。黄巢起义后唐王朝的命运日渐衰微，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使得大量文人纷纷走上了避世隐居的道路。据《唐才子传》记载统计，有唐一代以隐逸终老的诗人共有 46 人，而其中晚唐就占了 26 人。[1] 而随后到来的五代十国时期同样分裂动荡、矛盾重重，时代的剧变和割据政权内部的矛盾等种种原因使诗人们不断在诗歌中抒发对山林隐逸的向往，使得晚唐五代成为一个隐逸风气空前突出的时期，创作隐逸诗的诗人和隐逸诗数量都令人瞩目。不过，当前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还相对较为薄弱，主要成果有刘宁的《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张兴武的《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霍建波的《宋前隐逸诗研究》、王小兰的《晚唐五代江浙隐逸诗人研究》和《晚唐五代江浙隐逸文学生态研究》、黄艳红的《喧嚣中的静谧——五代隐逸诗述评》等。这些研究大多是将五代甚至是整个晚唐五代的隐逸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直接关注南唐隐逸诗的仅有谭钒《南唐诗歌隐逸情怀研究》一篇。而南唐作为五代时期南方文化重地，在隐逸诗的创作方面不仅以自己鲜明的特色独立于晚唐五代诗坛，更蕴含着由唐至宋隐逸诗风转变的线索和新的思想内涵。因此，拟对南唐隐逸诗精神气质上的变化进行更为详尽的梳理，以求对这一时期隐逸诗风演进的细节有更深的认识。

一、从孤介之气到平和之心

从历史上看，隐逸首先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精神属性的行为方式而存在的，其思想上的核心是对于“天下无道”的认知、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和对自身精神境界的追求，而其行为上的典型表征则是远离所谓“仕途经济”等一般人生的固有轨迹。但是，不同时期士人追求隐逸的心理动因却不尽相同。以唐代为例，初唐时期，由于上层贵族的大力倡导，身居高位而不忘山林成了朝廷官场的一种主流意识，许多士人为了获得上流阶层的认同，往往有意无意地把歌咏隐逸作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所谓“丘壑夔龙，衣冠巢许”成为士人的理想人格。这种心态在盛唐、中唐时期继续发展，并产生了对隐逸更多样化的认知。但不论是“终南之隐”还是后来王维的“心隐”、白居易的“中隐”，其实质都是士人企图调和“仕”“隐”矛盾的结果，仕隐的契合最终在白居易身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收稿日期] 2013－04－09　　[修回日期] 2013－06－09
[作者简介] 郭　倩 (1975—)，女，福建福州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但到了晚唐时期，这种契合的过程被再次打破。随着唐末社会动荡加剧，“仕”与“隐”之间的平衡失去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保障，大量士人由于科场腐败和士族垄断等因素流向藩镇幕府、山林草野，不仅进身之阶被阻断，甚至生存都成了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们已经很难再有所谓“心隐”“中隐”那样的从容心态，隐逸诗的特质较之中唐也开始有了明显改变。盛唐、中唐隐逸诗中那种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在这些诗人笔下已经很难找到，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孤介不平的气质——对艰危世事的忧惧、对社会不公的怨愤与不甘是这一时期隐逸诗的鲜明特色，是中唐“不平则鸣”的寒士精神与唐末残酷社会现实碰撞的结果。如陆龟蒙在《村夜二篇》中把自己隐居的原因描述为“世既贱文章，归来事耕稼。伊人著农道，我亦赋田舍”，归隐田园本就是不得志之后的无奈选择，但田园生活也并非一方净土，诗人仍然不得不面对“耕稼一以微，囷仓自然罄”的困窘和“万户膏血穷，一筵歌舞价”的残酷。当然，更让诗人感慨的是，自己尽管拥有“平生守仁义，所疾唯狙诈”的高尚情操和“岂无致君术，尧舜不上下”的治世之才，但最终却依旧一无所成。因此，诗人在篇末不无愤慨地写道：“长吟倚清瑟，孤愤生遥夜。自古有遗贤，吾容偏称谢。”① 因此，有论者以为，“唐末的江南隐士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洒脱自如的求仙梦想……代之而来的，是隐逸者对现实社会越来越多的失望感，以及由失望而引发的讥讽和呐喊”，[2] 信然。

进入五代后，随着唐政权的分崩离析，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也逐渐成长起来。在这些割据势力内部，经济往往都能得到较好的恢复，社会也较为安定，并且随着各地士人的大量归附而俨然成为地域文化中心，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南唐。南唐的隐逸风气较之晚唐虽然没能再上一个台阶，但隐逸诗的创作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参与了创作。而与晚唐相比，南唐的隐逸诗不论是在意境的营造还是情感、心绪的抒发方面，都有了显著变化。

首先是意境营造上的变化。在意象的选择上，南唐诗人更擅长于达成一种平衡，使得南唐隐逸诗整体呈现出来的意境显得更加平和舒缓。以“水”系列意象为例，晚唐隐逸诗更倾向于选择“露”“泉”“溪”“池”等细小的意象。统计发现，除罗隐、郑谷外，其余诗人使用这些细小水意象与相对较为宏大的水意象（如“江”“河”等）的数量之比达到了2:1，特别是在方干、皮日休、刘得仁、周贺几位诗人笔下，这一比例更高达3:1以上，即使是晚唐最擅长使用水系列意象的诗人许浑，这一比例也达到了2.4:1。而在南唐诗人笔下，这个比例则接近于1:1。因此，从整体上看，晚唐诗人喜用细小意象营造幽静孤峭的山林景象，而南唐诗人则似乎更善于在这两类意象中找到一种平衡：在表现山林隐逸情趣的同时，加入江河意象使他们笔下的山水画面显得更加平和舒缓。因此，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南唐隐逸诗对春季意象的特别偏好了——对春季意象的关注几乎达到了秋季的两倍，尤其是南唐诗人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建勋，这一比例几乎达到四倍。而晚唐隐逸诗中这两类意象的对比则远没有这么悬殊，在许浑、周贺、刘得仁、李洞等几位诗人笔下，对秋季意象的关注还远胜于春季。这样一来，由于意象选择和运用上的不同，晚唐隐逸诗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幽深峭奥的面貌，而南唐隐逸诗整体呈现出来的意境则显得更加平和舒缓。例如，同样是描写渔父形象或渔钓生活，在晚唐诗人笔下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这样的句子：“渔钓未归深竹里，琴壶犹恋落花边”（曹松《罗浮山下书逸人壁》，卷717）、“久立钓鱼处，唯闻啼鸟声”（方干《经周处士故居》，卷648）、“夜深回钓楫，月影出书床”（方干《陆处士别业》，卷649），意境幽深而显得相对较为封闭；而南唐诗人则不这么写：“遥陂过秋水，闲阁钓鱼船”（李建勋《田家三首》，卷739）、“遥思渔叟兴，蓑笠在江湖”（李中《秋雨二首》，卷748）、“与君共俟酬身了，结侣波中寄钓船”（李中《秋江夜泊寄刘钧》，卷749）、“垂钓月初上，放歌风正轻”（王贞白《题严陵钓台》，卷701），两相比较，很明显南

① 本文引诗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1999年版《全唐诗》。

唐诗人的作品要明快平和得多，意境也显得更为疏朗开阔。

而在修饰语的选择上，南唐隐逸诗也一改晚唐喜用灰暗色彩词汇的习惯，使诗歌意境更为温和明朗。特别在描摹自然景物时，即便是一样的对象，由于修饰语使用倾向的不同，也会对诗歌意境的塑造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晚唐不少诗人笔下，“残”“幽”“寒”“野”等偏于灰暗色调的修饰语被大量使用，例如在描写诗人与僧道隐士交往的生活时，不免要描绘隐士们的生活环境和周遭景物，在晚唐诗人如司空图的《赠信美寺岑上人》）、曹松的《访山友》、周贺的《送省己上人归太原》等诗中，这些僧道隐士们的居所和生活都充满了荒寒萧瑟的特征：寒泉、急雨、荒壁、穷冬、残角之类的词屡现笔端。而南唐诗人笔下的隐士们则逍遥洒脱得多，不仅居处风光秀丽，生活也充满了诗意：

白云峰下古溪头，曾与提壶烂熳游。登阁共看彭蠡水，围炉相忆杜陵秋。棋玄不厌通高品，句妙多容隔岁酬。别后相思时一望，暮山空碧水空流。（伍乔《寄落星史虚白处士》，卷744）

师住天台久，长闻过石桥。晴峰见沧海，深洞彻丹霄。采药霞衣湿，煎芝古鼎焦。念予无俗骨，频与鹤书招。（王贞白《寄天台叶尊师》，卷701）

而如果要从统计的角度观照这些作品的全貌，下面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方干281首作品中灰暗色调修饰语的出现次数达162次，而郑谷诗虽以清丽著称，在他408首作品中这类修饰语的出现次数也达到了175次，而司空图的152首诗中此类修饰语的数量更是达到了116处之多。南唐诗人除李建勋、王贞白外，多数诗人均远低于此比例。

其次，是情感抒发上的变化。虽然隐逸诗一般都会倾力抒写诗人耽于山水之间的悠游与闲适，但其背后隐藏的诗人心绪却未必相同。晚唐诗人最喜描绘“闲情”的诗人当属司空图，在《全唐诗》所载152首（句）作品中，“闲”字出现多达45处，以诗歌数量计则有42首，占比几近三成。我们不妨来看他的几首作品：

闲身事少只题诗，五十今来觉陡衰。清秩偶叨非养望，丹方频试更堪疑。髭须强染三分折，弦管遥听一半悲。漉酒有巾无黍酿，负他黄菊满东篱。（《五十》，卷632）

率怕人言谨，闲宜酒韵高。山林若无虑，名利不难逃。（《漫题三首·其三》，卷632）

在这两首诗中，司空图都以“闲”字来描述自己的隐居生活，但通观全诗，所谓“闲情逸致”却并不是作者表达的主要情绪。在清闲生活的背后，是司空图对年齿徒增的悲叹和对周遭“人言”的戒惧之心。“山林若无虑”，自然可以忘怀名利、坐拥林泉之乐，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人人语与默，唯观利与势”（《感时》，卷632）、“乃知不平者，矫世道终孤”（《效陈拾遗子昂感遇二首》，卷632），而即便自己隐居山林，但见“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红蓼满村人不在，青山绕槛路难平”（《浙上》，卷632）的景象，又如何能真正忘情世事！

而南唐诗人作品中的情况又当如何？我们不妨同样以吟咏闲情最多的李建勋为例。《全唐诗》载李建勋89首诗（句）中，书写闲情的作品也达到了28首之多，占比31%。我们来看看他的几首作品：

携酒复携觞，朝朝一似忙。马谙频到路，僧借旧眠床。道胜他图薄，身闲白日长。扁舟动归思，高处见沧浪。（《闲游》，卷739）

窗外皆连水，杉松欲作林。自怜趋竞地，独有爱闲心。素壁题看遍，危冠醉不簪。江僧暮相访，帘卷见秋岑。（《金陵所居青溪草堂闲兴》，卷739）

这两首诗描绘了李建勋的闲逸生活，与前举司空图所作相同的是，两人都把饮酒作为隐逸闲适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如果说司空图的“闲”还带着一种无奈和悲凉，在李建勋的诗作中，我们看到的就只有彻底的放松和闲适了。诚如刘宁所言，“司空图的作品，从整体上看，交织着家国之思与不无庸俗的闲适之趣。这两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而且一直贯穿在司空图的精神世界里。”[3]而这种挣扎和不协调在李建勋的诗作中几乎是看不到的：“从此唯行乐，闲愁奈我何”（《春日东山正堂作》，卷739）、“闲听不寐诗魂爽，净吃无厌酒肺干”（《春雪》，卷739）等等都是。同时，在南唐不仅是李建勋这样的朝廷大员，甚至连李中这样的地方小吏也同样有着

“溪上高眠与鹤闲，开樽留我待柴关”（《宿韦校书幽居》，卷749）和“泛泛容渔艇，闲闲载酒壶”（《题徐五教池亭》，卷750）的悠闲心境。

因此，晚唐诗人反复咏唱闲情，固然有其纵情山水、恣意逍遥的一面，但在“闲情”背后却更多地蕴含着对世路不平的悲慨和壮志难申的郁结愤懑之心，外在的“闲情”只是对现实无奈的一种被动回避，内心深处仍然充溢着孤介不平的气质；而对南唐诗人而言，吟咏闲情更多地成为他们的一种自觉和追求，成为一种从容祥和的诗意的生活方式，晚唐隐逸诗的灰暗基调在这里已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秀美山水和闲静生活的描述所带来的清丽明快，体现的是诗人平和圆融的心境。

二、影响南唐隐逸诗变化的因素

南唐隐逸诗出现的种种变化绝非偶然，而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变化不仅开启了晚唐之后诗歌艺术艰难转型的过程，也体现了文人心态和创作风气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梳理、把握这一变化的轨迹。

首先，南唐士人生存环境的变化是滋生“闲情”、表现出平和之心的基础和保障。与晚唐相比，南唐士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已有了不少改善。虽然三主时期南唐疆域略有变化，但其文人活动主要集中于富饶的江南平原一带，这从前文对南唐隐逸诗的意象统计和分析中已经有所体现。而下面一则史料则更能说明不少南唐士人对优裕物质生活的依赖程度。据《新五代史》卷六十二记载，周世宗曾向李璟建议“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为子孙计”。李璟于建隆二年迁都南唐腹地洪州，洪州虽然已经大规模营建，但南唐君臣仍然觉得“宫府营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归”，最后君臣大小只好再回金陵，当初赞同迁都的枢密使唐镐“惭惧，发疾卒”。[4]因此，丰厚的物质基础使得大多数南唐诗人自不必为衣食所困，真正的平和闲逸之心就有了生发的可能。

同时，南唐士人所处的政治环境也远胜于晚唐。考察前文所举大量创作隐逸诗的诸位晚唐诗人生平，我们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有连败文场的痛苦经历，不少人历数十年而未得一第。与此同时，士族出身的朝廷要员比例越来越高，出身小姓与寒素者几无立足之地。有资料显示，德宗时期宰相出身士族者13人，出身小姓者14人，出身寒素者达8人，士族所占比例仅有37%；而懿宗、僖宗、昭宗时期这个比例分别达到了71%、69%、67%。[5]即使是进入了中央权力集团的少数人，其命运之艰危也有目共睹。自中唐以后屡屡出现的宦官专权滥杀文人的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对于那些投奔地方藩镇势力的文人，其生存环境同样恶劣，类似钱镠迫罗隐、杀吴仁璧，王建迫冯涓、杀张道古等例子屡见不鲜，甚至文人之间由于嫉恨而自相残杀的例子也不少见，《后村诗话》卷三云：“唐人尤重进士。其末也，如李振劝朱温一日杀司空裴贽等百余人于白马驿，苏楷进昭宗谥，李山甫教乐从训害王铎一家三百口，皆不得志于场屋者为之。”[6]

而南唐文人们的境遇就大不相同，不仅晚唐那些威胁士人生存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进身之路也明显增多。虽然南唐科举不兴，但由于统治者致力于网罗人才，这反而使一般文士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更快达成目的。《江南野史》卷一：“……及（李昪）执政，乃治府署之内立亭，号之曰‘延宾’，命宋齐丘为记，以待多士。于是四方豪杰翕然归之。”[7]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时甚至“言事遇合，即随材进用，不复设礼部贡举”、[8]“然未尝设科举，多因上书言事拜官”。[9]此外，先主李昪还广建学校培养人才，由同学师生关系而得援引者也大有人在。因此，南唐士人在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双重作用下，确实很难再发出晚唐隐逸诗中那种被逼上绝境之后的不平之声了，这就为南唐诗人在隐逸诗中大力推崇闲情逸致留下了足够的心理空间，也为他们在创作隐逸诗时不断精雕细琢、展现个人情怀腾出了足够的时间。

其次，传统儒家精神的失落导致士人心态、个性的转变是南唐隐逸诗表现出平和之心的关键原因。南唐“累世好儒”，但这里的“儒”只是“儒士”之儒，而非“儒学”之儒，因此，南唐之崇儒，更多地是从统治的角度出发的。重用儒士，主要是看中了他们整理朝纲、巩固统治的能

力。如江文蔚，马令《南唐书》卷十三载："文蔚既擅价一时，又励行义，自为郎，时南唐礼仪草创，文蔚撰述朝觐、会同、祭祀、宴飨礼仪，上之，遂正朝廷纪纲。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礼，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员外郎，判太常寺。"[10]312-313李昪之所以能开创南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接礼儒者，能自励、为勤俭、以宽仁为政"，[10]249而南唐立国后的种种国策如建立典章制度、养民息武等，都是儒家民本、教化说的体现。从这些史料来看，南唐之崇儒在很大意义上是功利性的，"儒士"不过是"文官"的代名词罢了。儒家制度大规模恢复和重建的背后，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和传统儒家精神中积极用世理想的失落。反观晚唐隐逸诗中流露的孤介不平之气，其怨愤、悲叹、无奈甚至是厌世情绪更多地是秉承着强烈的用世之心而来，是由于政治理想不能实现而郁结于心的结果。因此，不少南唐诗人在面对个人挫折甚至是国家危难的时候，也往往不再表现出晚唐隐逸诗中那种扞格不入的抵触心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随时俯仰的平和与从容。

以南唐首屈一指的"大儒"徐铉为例。徐铉受宋齐丘、汤悦排挤被贬泰州，后又坐专杀流舒州，两次无辜被贬，徐铉却从未将矛头对准任何人，反而一再书写自己"一身无累似虚舟"（《贬官泰州出城作》，卷752）的从容心态和"绕郭林泉已遍游"（《贬官泰州出城作》，卷752）、"三峰烟霭碧临溪，中有骚人理钓丝"（《赠泰州掾令狐克己》，卷754）的谪居生活；而当他在南唐覆亡、随李煜入宋之后，也很快适应了在北宋朝廷中的新角色。至于他反复声称的"容臣存故主之义"，实际上也不过是为了标榜"忠臣"而获取宋祖宽容的一面挡箭牌。不仅如此，徐铉还试图借助对儒家传统出处观和忠义观的重新阐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出处论》中徐铉提出，于陵、轮扁、弦高之类的隐士并非"桎梏轩冕，糠粃爵禄"，而实在是"不肯无功而徼利，故任力而自食，以免贪冒之罪"；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也不是抱节守志的典范，而是为了"知以臣伐君之恶也大矣"。只要能"为之君师而司牧之，教其不知，恤其不足，安其情性，遂其生成，为之立上下之节，正长幼之序"，就可以是"大人君子至公之举"，不必以一国一姓而定出处。[11]188-189综合分析这几段论述，我们很容易发现徐铉把"儒道"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只不过是借泯灭出处之界限，为自己的人生找一条出路罢了，而并非真正要身体力行地在文学创作中去实践儒道。

因此，南唐隐逸诗更多地是作为诗人们用以突破现实尴尬的一种路径而存在的，它所反映的只不过是诗人的个体情绪和对生活的体认，以及他们试图调和生活、思想上种种矛盾的努力。当诗人们的情绪已不再激昂，理想也已不再高远，我们当然也就不能奢望他们的作品会包含多少孤介不平的逸士精神了。

第三，南唐隐逸诗中呈现的平和之心还是追求诗歌风雅含蓄之味的自然结果。诗歌的艺术风格与精神内涵密切相关，后者通过前者呈现，而诗人对前者的追求同样会对后者产生微妙的影响，并进一步融合为诗人的整体人格。南唐人论诗不多，然多推崇风雅，这和朝廷的倡导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孟宾于在为李中《碧云集》所作序文中说："然六艺之旨，二南之风，后来未甚穷目，沉沦者怨刺伤多，取事者雅颂一贯"，[12]153很明确地将继承"六艺之旨"、"二南之风"作为评价诗歌创作的标准之一，并认为"怨刺"过多是背离诗之宗旨的。马令《南唐书》卷十三记载，孙魴与沈彬、李建勋结为诗社，"彬好评诗，建勋尝与彬议，时魴不在席，以魴诗诘之。彬曰：'此非有风雅制度，但得人间烟火气多尔。'魴遽出让彬曰：'非有风雅固然，而谓得人间烟火气何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划多灰杂苍虬迹，坐久烟消宝鸭香"，非炉上作而何?'阖座大笑"，[10]313也将"风雅"作为论诗的标准。而在朝廷大儒徐铉的《成氏诗集序》、《文献太子诗集序》、《御制春雪诗序》中，亦多见此类论述。甚至李煜也认为"为学为文，莫若讨论六籍。游先王之道义不成，不失为古儒也"（《御制杂说序》）。[11]142由此可见，推举风雅不仅是南唐君臣的共识，也是朝野文士一致的看法。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南唐诗人尽管并不排斥情感的表达——"人之所以灵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萧庶子诗序》），[11]145但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情感的抒发必须是有节制的，这正是儒家传统诗教观的精髓所在。因此，在南唐隐逸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不满时事的牢骚与怨恨，取而代之的是对隐逸生活的不尽颂美和向往，以及对个人命运的自怜自叹，呈现一派平和蕴藉的士大夫风度。同时，这种观念还进一步影响着南唐诗人的行事作风和品评人物的视角。据《江南野录》载，李洞曾献诗百篇于后主，然并不见用 。后南唐国亡，“洞过故宫阙，徘徊赋诗，多感慨悲伤，不以不遇故作怨怼语”；[12]136陈贶隐庐山40年，“布裘鹿鞟，进止闲雅有度”；[12]145徐铉评邓生曰“悔吝不及，终始无累，至于皓首，未见愠容。家贫晏然，惟诗稿盈箧”（《邓生诗序》），[11]182这就是南唐诗人普遍推崇的平和气度。受此影响，我们在南唐诗人及其隐逸诗中几乎看不到晚唐陆龟蒙那样的“散人”、听不到司空图式的“诡激不常”的言论，甚至也没有宋初潘阆、张元、姚嗣宗之类的狂怪奇僻之士，而是平和蕴藉、温柔敦厚的一派君子之风。

总之，随着唐末的动荡渐近尾声，诗歌创作也正酝酿着新的变革。隐逸情怀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主题，到此时也渐渐被赋予新的含义，应当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参考文献]

[1]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14－119.

[2]王小兰．晚唐五代江浙隐逸诗人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7.

[3]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35.

[4]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77.

[5]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6]刘克庄．后村诗话[M]//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14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31.

[7]龙袞．江南野史[M]//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4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2.

[8]陆游．南唐书[M]//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4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45.

[9]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四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0：880.

[10]马令．南唐书[M]//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4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徐铉．骑省集[M]//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10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王士禛，撰．郑方坤，删补．五代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From Conscience to Tranquility
——On New Changes in the Poetry of Seclusion from the Lat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o Nan Tang

GUO Qi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Poetry of Seclusion was in blossom in the lat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e poets then lived in a secluded and aloof way and their poems were to express their deep concerns and conscience on the turbulence and injustice in the society. When it came to Nan Tang period,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poems tended to be more peaceful and calm, and poets' emotion was becoming smoother. These differences were due to the official's disappointment from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Confucius spirit and the change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Meanwhile, it was also a natural result from the poets' pursuit of implicitness and grace in the poetry.

Keywors: Poetry of Seclusion; conscience; tranquility; the lat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Nan-Tang

（责任编辑　林　芗）